

【書文評介】

作者：徐興慶

書名：《東アジアの覚醒—近代日中知識
人の自他認識》

東京：研文出版・2014年8月・319頁。

ISBN：978-4876363810

呂玉新*

目次

序章 近代日中知識人の相互認識

第一章 箕作阮甫、塩谷宕陰、佐久間象山の思想変遷

第二章 王韜と中村正直、岡千仞の思想比較

* 浙江外國語學院外聘教授、美國聖約翰大學客座教授

第三章 伝統と近代の間—福沢諭吉の儒教批判への試論

第四章 岡倉天心の「アジアは一つ」をどう読むべきか

第五章 小室信介の中国観—『第一遊清記』を中心として

第六章 近代文化論から見た李春生の日本観

第七章 張德彝の異文化論説

第八章 近代中国知識人の日本体験—梁啓超、林猷堂と戴季陶の日本観の比較

近代東アジア人物思想交流史研究と著者をめぐって（伊東貴之）

あとがき／索引

一、前言

1868年の明治維新，是日本自17世紀初德川幕府建立後首見一大社會轉型動盪。世界航路開通後，歐洲國家在16世紀為追求諸如香料、金銀等物質經濟利益，並兼帶有傳教與殖民目的，穿梭於世界各洲，其活動影響遍及各地。但19世紀重返亞洲的西方國家，則是經現代工業革命後所武裝起來的帝國主義，在人類與自然世界中攪起巨震。日本的明治維新，是由西方壓力所促成之社會巨變；但如何據時勢而變，則是日本社會基於德川時代（1600-1868）思想界所立之意識形態所激起的內部震盪。清朝社會對此新形勢之應對，亦不脫此框架。臺灣大學徐興慶教授的新書《東亞覺醒——近代日中知識人的自他認識》（東京：研文出版，2014），討論的就是這一時期東亞思想者的認識。其不僅對關注此時期社會思想動態的學人有開卷之益，也是了解20世紀前期日本

最終走向極端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的社會思潮之重要參考。

徐教授專攻明末中日思想人的思想與活動，所涉廣泛，近年更及 19、20 世紀的中日學人思想。此書主要涉及對象為日本學人，其中也涉及數位中國學人，如自認是魏源繼任者、曾以民間身份訪日的王韜（頁 89）、李春生、張德彝、梁啟超，以及林獻堂與戴季陶。日本方面，多是活躍在明治維新時期前後的思想者，如佐久間象山、岡千仞、福澤諭吉、岡倉天心等；中國方面，還介紹了出身福建、居住臺灣的名商李春生在此動亂時期的生涯與其思想變化。此書中已收有伊東貴之教授題為「關於近代東亞人物屬性交流史研究與本書作者」的書評。伊東氏精於中國明清思想，對此書的分析與解說頗得要領。筆者拙評唯就閱讀學習心得，結合個人關心課題稍添蛇足與讀者共享。

16 世紀的航海地理發現，使得世界各地因首次經貿一體而呈現新局勢。西方對東南亞地區之殖民，傳教士大舉來到東亞，世界地圖在東亞地區的出版、天文地理、幾何數學、槍炮技術、農作物與香料的傳播、貿易的增長，地區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長、社會思想之變化等，均為顯例。在此形勢下，明朝中後期中國沿海展現了經濟活力，私貿海盜昌盛；在思想方面，則出現從古學推陳出新、學以經世的一元論，以及嶄新地從體制根本思考政體構造的新探索。在日本，地方平民力量遽起、本已衰朽的莊園制被徹底擊滅、擁有火炮長槍隊新型武力而最後勝出的日本武霸大名，都與此新形勢帶來的衝擊有關。

二百年後的 19 世紀，清朝思想界因政治高壓而埋頭於文字訓詁（樸學），德川幕府也因長年鎖國，造成初期學術思想活潑，中後期則日益走向文化相對孤立主義之境；相比之下，西半球則進入影響全人類文明大發展的新紀元。此時期西歐，經個人宗教信仰自由，出現了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經探索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所謂「自然法則」（*natural law; social natural law*），產生了科技革命、產生了對政體構成之思考與實踐，從而登上了新的歷史文明舞臺，成為推動世界文明發展的一大新促進劑。英國，這個受惠於市民信仰及人權日漸得到尊重的虛君政體制社會，極大地激發了科技創新動力，生產力大為發展，率先實現了人類歷史上首先依靠機器為動力的工業革命。英國的工業革命，隨即被不同體制的歐洲各國效仿（當然包括君主專制國家）。19 世紀起，歐洲各國新興的資本主義，為追求最大經濟利益，同時，其人民也為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開始挾武力，爭先恐後地向世界進行帝國主義大擴張。東亞地區與其它非西歐國家，在這一新世界形勢下，被迫進入劇烈社會轉型的痛苦歷史階段。另一方

面，如何進行社會轉型，即便在東亞地區內部，因文明傳統、政治體制、學風所向以及思想界認識之異，所取之道路各顯不同。此衝擊過程，無論對本國、區域、還是世界文明，都帶來了值得返視、深思的歷史教訓。

二、社會對介紹近代西方情況的反應

《東亞覺醒——近代日中知識人的自他認識》為日文版，全書共八章。書後有人名索引，各章結尾處添加了尾注，以方便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擴展研究。此書序章為〈近代日中知識人的相互認識〉，內含「本書之課題」、「什麼是『自他認識』」、「從思想變遷入手」、「近代日中知識人的歷史意義」，以及「近代日中知識人的共同點——通過翻譯攝取西洋文明」與「近代日中知識人的智慧與其現代意義」。徐文指出，近代中日知識人的共同點，都是通過翻譯來攝取西方文明（頁 12-21）；而且當時日本知識界中，即有期望中日聯合發展以抵抗西方勢力入侵者的聲音，也有在得知清政府腐敗的實情後轉向藐視清政府與華人的學人。（頁 22-23）當然，也有諸如福澤諭吉那樣，鼓吹「脫亞」，不但對中國國民抱有輕蔑感，還挑唆侵華戰爭者。（頁 23）不難看出，當時立基於德川封建體制的日本，經明治維新，結束了封建分封體制，有驚無險地「尊皇納夷」、擁抱專制君主立憲、建立了以天皇親政名義的中央集權體制，完成了實現產業革命的社會轉型。實際上，此君主立憲制比其所仿效的普魯士帝國更專制；而幕府末期的「尊皇攘夷」主張，只是被下級武士用以推翻幕府政權的口號而已。這些原來的下級武士，為踢開影響實現其個人抱負的階級等級制度，故意處處使已朝向「納夷」制努力的幕府難堪，最終使得幕府垮臺。

德川幕府晚期，以尚武為傲的風習、鎖國二百年後經日本國學（本居宣長、平田篤胤等）與後期水戶學（藤田幽穀、會澤正志齋等）煽起的極端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思想，深得社會青睞。此社會思潮與西方傳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一拍即合，全國上下激情昂揚，要朝向「文明」進軍。這個猛然擺脫鎖國體制與文化孤立主義的所謂特色「國體」進入西方主導下的世界體系，經國家規劃與引導的產業化發展，襲西洋器物之利，欲達新形勢下的對外「天下布武」戰略。

其社會上下皆熱衷窮兵黷武之主張，客觀上已具舉國對外進行軍事侵略擴張的基礎。事實上，成為明治新政府主幹的原德川幕府體制之下級武士，與日本國民攜手率領憲法上只隸屬於天皇而非政府管轄的「皇軍」，於 1875 年滅亡、侵占了琉球王國；隨即又啟動甲午戰爭，並強割臺灣為其殖民地；繼之，又進一步入侵中國東北與朝鮮，日漸走上軍國主義的不歸路。

反觀中國，深嵌學人記憶中但未成正果的宋學君臣共治之識，在明末再次以新形式綻放。17 世紀初，江南一帶出現了通過提倡孔子尊虛君理念、從體制上反思君權專制之弊、倡導體制改革的思想與呼聲，其實為中國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振聳發聵之新創；但因滿清入關後清政權對意識形態的嚴厲鎮壓，使得此新思有如曇花一現，稍縱即逝。清朝君權專制，不輸貧農造反起家的內斂明朝政權，拒絕開放、堅拒改革；削髮垂辮的讀書人學非能用，政權對外則敗戰連連。最後，竟產生違逆民心與文明發展潮流的保守皇族內閣。徹底失去全民支持的清政權被全民推翻，痛失避免流血大亂、憲政改良機會，一損俱損。

本書第一章為〈箕作阮甫，鹽穀宕陰，佐久間象山的思想變遷〉。箕作阮甫（1799-1863）出身醫生世家¹，習儒學蘭學，精西語，除翻譯西方醫學與介紹西方先進的技術書外（如 1849 年應薩摩藩主請求翻譯的《水蒸氣船說略》（頁 41）），作為一介民間人士，也深切關心世界情勢與日本國政。箕作在鴉片戰爭後立即指出，「甚至唐土之大國亦在攻掠威勢下陷落，本邦（日本）受其害之日亦不遠矣」，（1841，頁 36）；其在 1844 年制作出版了《新制輿地全圖》，²並在次年出版了《坤輿圖識》。在《新制輿地全圖》中，箕作將世界各國列為獨立國家與被殖民國家，顯出了他對世界形勢的了解與憂患意識。

箕作阮甫的《新制輿地全圖》，甚像 1843 年 1 月出版的魏源五十卷《海國圖志》，均源於西文。《海國圖志》的基本素材，源於 1841 年被革職遣戍新疆伊犁的林則徐交與魏源的《四洲志》。《四洲志》是本未出版的翻譯書，是林則徐於 1839 年以慕瑞（Hugh Murray）在 1836 年於倫敦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為底本所編譯。³ 問題是魏源的《海國圖志》在當時的中國未引起關注，倒是在日本大受歡迎，多次翻印、一時洛陽紙貴。⁴ 這種現象與心態，在今日國人

¹ 參見津山洋學資料館。<http://www.tsuyama-yougaku.jp/mitukurigenpo.html>

² 徐作將《新制輿地全圖》制作日期標為 1809 年（頁 36），應是版誤。

³ 雷頤，《歷史的裂縫——對歷史與人性的窺探》（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 177。

⁴ 參見馬勇，〈《海國圖志》——一本啟發了日本的中國新書〉，《新京報》2014 年 7 月 26

中是否尚存？

吉田松陰的業師、信濃松代藩的佐久間象山，雖出身於下級武士，也顯示了其關心海外局勢，持憂患意識、務實的一面。所以除了松陰之外，佐久間象山門下人才輩出，諸如勝海舟、坂本龍馬、加藤弘之等，他們都成為明治維新前後的風雲人物。另一方面，19 世紀的日本，經長年鎖國，文化孤立主義觀下日本社會盛起並充斥著對日本國家與民族、國學與國體優越無比之認識。⁵因而，較具務實思想的佐久間象山抨擊幕府「（日本的）鎖國禁航海令是早就應該廢除的惡法」；（頁 63）同時，他也高傲地宣稱：「全世界最聰明的人種是日本人，日本文化與外國相比，顯著的不足是沒有科學。」（頁 62）

我們也應該看到，箕作阮甫與吉田松陰，無論在對機械之關心方面、還是在對世界上其它國家具體認識方面，與在《海國圖志》中添入《釋五大洲》、《釋昆侖》，與只認滿清天朝為世界上最上國的魏源相比，都有顯著的差異。

本書第二章起所涉，均為日本明治維新後人物，如第二章〈王韜與中村正直、岡千仞的思想比較〉；第三章〈試論福澤諭吉對儒教之批判〉；第四章〈應如何解讀岡倉天心的「亞洲為一體」〉；以及第五章〈小室信介的中國觀——以《第一遊清記》為中心〉。徐文指出，主張導入西方新知識的王韜，看出許多持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主義觀點的西人「對我華民甚薄」，「侵我日深」。1864 年，王韜得知英法美荷四國聯合艦隊攻日本下關，即上書李鴻章，指出「日本通過與美國十年通商，學得槍炮蒸汽船機械制造技術。日本為東洋小國，尚能奮鬥努力不負西洋人，我等又何可不能為？」（頁 91）。

首現工業革命的英國之所以強大，是政治體制運作之結果；器物先進，則是此體制激發所產生附屬物而已。此政治體制，因能激發民眾主動積極工作提

日 B12 版 (<http://jds.cass.cn/Item/26365.aspx>)；雪珥在〈甲午戰爭中國戰敗 西方國家為何反而同情日本？〉一文中也提到：「19 世紀 60 年代，日本幕府第一次派代表團到中國來考察，其中有個成員叫做高杉晉作，在明治維新時擔任著名的「奇兵隊」隊長。他到上海書攤買書，問魏源的《海國圖志》有沒有？書店老板說不知道此人此書。魏源的《海國圖志》寫好後，在中國無人問津，而在日本反倒成了暢銷書。書店店主拿出了一堆怎麼應對科舉考試的書給他。高杉晉作又要買抗英名將陳化成、林則徐的書，都沒有。高杉後來在日記中深為感慨中國人的思想和中華的正道相差太遠，中國知識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實學。」雪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 西方國家為何反而同情日本？〉，《鳳凰網》，2012 年 04 月 30 日，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2_04/30/14248025_1.shtml。

⁵ 國學，為皇國之學的略語，由國學創始人之一的荷田春滿首創；日本的國體一詞與詞義，為 18 世紀後半期興起的後期水戶學所創。

高他們自己生活水平，而受民眾珍惜，不斷以非革命方式調正，否定專制獨裁，得以長存。即便反對資本主義、提倡共產主義而被本國流放的馬克思（1818-1883），也能被容納在資本主義的大本營英國居住終身。對此，視天下均為自家王土、視三扣九拜、全失人格的官吏為家奴的專制皇權集團，怎會理解、又怎會自願進行自損己利的改革？堅拒體制改革，加大私財與貧富差距，只能帶來專制政權受益者日感危機、草木皆兵、奔命於解決層出不窮的突發事故，殘喘待斃。高喊自信、獨具特色「萬世一系，永永尊戴」的清皇朝，⁶巨款購艦、以新式洋槍炮裝備起來的北洋艦隊，在甲午戰爭慘敗，卻未震醒皇權，反而走向更加保守的皇族內閣，加速了專制政權倒臺，足以今人鑒否？

徐文另指出王韜還是個高唱中國中心論的人物。不甚了解西方文明的王韜宣稱，「中國是天下宗主國」，理由是中國「不僅為文字始祖，禮樂制度和天算器藝等亦均從中國傳往他處」（王韜《原學》，徐文頁91）。先秦儒家建國思想基於重「仁」的文教禮樂體系，化外自亦以此為重；⁷而當時所識天下，僅為中原所及。王韜此時所指天下，自是航海大發現以來之世界，其仍持中華為天下宗主國之思，顯出當時即便思想開化之思想者，與西方知識界認識仍有巨大差距；而其一廂情願地欲以禮樂度化外民之思，也顯示了當時中國著名學者甚是幼稚之認知。僅筆者近年會議所見，大陸學界中現今仍有諸如將東亞理學視為大陸之旁枝者，而還有鼓吹特色國情文化為世上獨有至尊為時興；此類現象不啻提醒世人，狹隘的文化沙文主義餘毒之深。

德川日本，經270年建制，城鎮居民（城下町）人口與市民經濟力大幅度提高，官辦學校與民辦私塾普及，包括蘭學（略稱為荷蘭學的西學）在內的諸學派相互競豔。此外，還湧現了不少受過學而優則仕的儒學教育，懷抱有人生大志向但卻因體制束縛、難有出世機會的下級武士或上、中層武士家庭非長子。社會經濟之變化，也使得此封建等級制度之根基日益鬆動。19世紀下半期，西方挾武力迫日本開港以貿易經商，也使社會轉型以劇烈動蕩的手段加速實現。另一方面，在意識形態方面，認為日本國、日本民族是全世界最優秀者之識，在當時社會已具相當基礎。此日本國與日本民族為全世界最優之識，是18世紀以來日本國學者通過對古典中的政治神話史之詮釋、確認，以興建新

⁶ 1906年頒佈的《大清帝國欽定憲法大綱》語。

⁷ 古時中國，對於化外之態度，可從《禮記·曲禮篇》「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中可知一斑。

民族身份 (national identity) 而立；而國學者此理論之展開，則是在古學的直接刺激與影響下。以伊藤仁齋與荻生徂徠等為代表的古學創始人，受明末學潮影響（直接媒介為朱舜水）；古學事學之目標，是探索先秦儒學所倡三代之治與聖人之教之真諦。但是伊藤、荻生之後，日本與中國思想界對於何謂聖人之教，何以實現三代之治之見解出現了內涵上的不同。⁸

18 世紀前後的德川日本思想界，有學者將日本未經文教普及、未踐聖人之教，卻實現了猶如周朝的虛君封建體制（三代之治）之因，歸結為日本人生性淳樸率真。荻生徂徠門生、儒學者服部南郭可謂此思維之代表。此外，兵學家山鹿素行（也曾一度從事古學）則解釋日本因尚武崇武，得以實現虛君封建體制，日本因而優於中國。⁹在經年鎖國，文化孤立主義發酵的情勢下，18 世紀後的國學創始人本居宣長、平田篤胤以及後期水戶學人藤田東湖及會澤正志齋等更是斷言：只因日本天皇為神孫、日本為神造之國，故日本自然而得「百王一姓」體制，也因此，神國日本與神孫子民的日本人，優於全世界國家與民族。¹⁰無論是明治維新後的福澤諭吉、在 20 世紀初及八十年代盛興一時的「日本人論」，還是二戰時日本士兵對他國平民進行的活體解剖及大屠殺，皆體現了此社會思潮。專制政權遏制媒體自由、統一洗腦帶來之惡果，史可為鑑，是最終刺向己方的鋒利雙刃劍。

⁸ 參見呂玉新，〈東亞政治文明思辨中的古學之興——朱舜水、山鹿素行、荻生徂徠〉，《政治思想史》，Vol. 17（2014 年第 1 期），頁 124-152；〈東亞政治發展史上古學的興起與重要性——細審伊藤仁齋與朱舜水之互動〉，《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 5 期（2012 年 6 月），頁 95-132；〈「日本儒學研究」專題-132 與朱舜水之互動〉，《仁齋轉向古學之路》，《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4 期），頁 38-45；以及〈文明史鑒：日本國學影響下的極端民主主義濫觴〉，《二十一世紀》，Vol. 142（2014 年 4 月），頁 14-23。

⁹ 山鹿素行，「愚生中華（素行在此將日本指作中華）文明之土，未知其美，專嗜外朝（在此指中國）之經典，嚶嚶慕其人物，何其放心乎。何其喪志乎。抑好奇乎，將尚異乎。夫中國之水土，卓爾於萬邦，而人物精秀於八紘。」山鹿素行，《中朝事實》，《山鹿素行全集 思想篇》，第 13 卷，頁 226。

¹⁰ 譬如，本居宣長說，「先前，普照四海萬國的天照大御神，生自日本。故，日本為萬國之元本、為大宗主國，萬事均優於異國也。其詳細罄竹難書，此僅舉二例為證：一、本國稻穀優於各國，無可類比之……；二、本朝皇統，即普照此世的天照大御神之胤，如其天壤無窮之神勅，與天地一起，永世長存、代代相傳」。（本居宣長：〈玉しくげ〉，《日本古典文學大系 97·近世思想家文集》（東京：岩波書店，1966 年），頁 326-327）；平田篤胤強調，「本國要害，勝於萬國也……日本風水要害之好，萬國最上也。住乎浦安之大城，備乎千矛之武德，而永久與天地無窮矣。此民者神明之孫裔，而此道則為神明之遺訓也。」平田篤胤，《古道大意》（東京：平田學會事務所，1912），頁 55。

三、共同體：岡倉天心的呼聲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互聯網新經濟模式蓬勃發展之今日，企業因跨地區經營與合作，將世界各地區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而且這種趨勢終會是人類文明發展之方向。因此，不同地區與國家的人民更需互相了解、平等互助，以為共同發展。但是，由於文化背景不同、各國間體制之不同、信仰及意識形態不一、加之人與其群體在私利與公共利益（或其它族群、國家）上的認識、要求與把握不一，在朝向和平共處、共同發展的過程中摩擦自不會少。怎樣平和文明地越過這些溝壑，是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的摸索與實踐，更是學人需理性思考、反思之職責所在。

徐氏在此書中特闢第四章，專門討論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提出「亞洲一體論」的岡倉天心（1862-1913），顯示出其對上述問題之關切。該章標題為：〈我們應該如何讀岡倉天心的亞洲一體論？〉徐氏指出：在明治時期的日本，從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亞洲、特別是東亞問題，皆與日本的國家前途緊密相關。其中有關西方文明之傳入（入侵），對日本不僅是巨大沖擊，也關係到如何對待西方文明：其涉及到以何種觀念制定外交政策的難題。是對抗、脫亞還是興亞？徐氏認為：也因此，岡倉提出的「亞洲一體論」，不但在當時，即便在被稱作 21 世紀是亞洲的世紀之今日，仍是揮之不去議題，我們需通過「亞洲一體論」之志向，重新思考今日東西文化融合與建構的方法（頁 176）。

徐氏首先介紹了丸山真男的論說，指出丸山認為岡倉所唱「東亞（東洋）一體論」、「東亞的理想（文化創造力）是自發、未受近代沖擊」說，是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上的政治羅曼蒂克；岡倉與福澤諭吉相比，明顯缺乏對體制批判精神。然後，分別以數百字篇幅介紹了伊藤正雄（已故）、竹內好（已故）、末木文美士（日本國際文化研究中心）、孫歌（中國社科院）、以及山室信一（京都大學）對岡倉亞洲一體論的大致論斷。隨後，徐教授展開「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天心有關以本國為中心的呼籲？」的討論（頁 185-192）。此討論，又細分為「有關亞洲（日本）美術發展之倡言」、「對戰爭之見解」，以及「從否認模仿西方到容忍」三部分。通過研讀岡倉「日清戰爭確認了我國在東亞水域的支配權，兩國（日清）更進一步加強了友好關係……等待作為新亞洲強國日本的巨大問

題與責任，我們應該挺身而出」之言論，徐氏指出，岡倉的「亞洲強國日本的使命」和「日本中心主義」使人感到不自在（頁 190）。在該章的最後一節「總結與課題」中，徐氏總結道：自岡倉天心提出亞洲一體論後，時間已逝約一世紀，議題內涵因之呈多層性、多義性；亞洲與歐洲接近的空間中，產生了文化身份與政治身份問題，此方面議論至今不絕於耳；無論東西方，要是將對抗作為前提，那就不可能成為一體；也因此，需要充分認識相互融合的重要性，找出消除矛盾的方法，否則，難以避免走入歧路。（頁 193-94）

找出產生矛盾的根源，破析問題所在，確實重要。

19 世紀後半期，工業革命後的西方國家，為攝取原材料以供大規模機器生產，輸出產品，以武力進行了世界性的野蠻帝國主義擴張；但在另一方面，實現產業化革命之西方，被中日韓諸多學人視為真正實行了君主禪讓、具「三代之治」民富國強、四民平等的典範。此形勢下，僅從口號上看，高唱亞洲為一體的岡倉天心（1862-1913），同高唱「脫亞入歐」的福澤諭吉一樣，不啻為當時日本思想界中的一顆異星。岡倉的主張對孫中山的亞洲主義觀有影響，其「日本中心主義」的亞洲一體觀，不但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大川周明的思想架構予以重大影響，與後來的日本軍國主義喧叫的大東亞共榮圈思想也深有關聯。此時期，日本諸多名學人與名思想者，諸如岡倉天心、民俗學者柳田國男（1875-1962）、稍後的折口信夫（1887-1953）、甚至以研究宗教為業的東京帝大教授宇野円空等，對 20 世紀前期日本最終走向極端民族主義、軍國主義，都起了不小的推進作用。¹¹所以，岡倉基於東亞美術傳統展開的亞洲一體論，

¹¹ 譬如，柳田國男曾提出要用科學辦法，通過調查民間傳說，將在日本民間隱藏的精神實體挖掘出來，以證實日本文化之獨特、證明日本民族優於世上所有其它民族。柳田國男的時代，也是日本對北海道、朝鮮、沖繩以及臺灣侵略占領的年代。曾作為內閣法制局參事官的柳田，還因功獲得五等瑞寶勳章。雖然，柳田在《神道私見》中認為，日本的神社只是對祖先和偉人表尊敬的地方而已（柳田國男，《神道私見》（寫於 1918 年），載《柳田國男全集》（東京：築摩書房，2000），卷 25，頁 245）；但他視察東北、北海道、新近成為日本領土的樺太島，以及閱讀臺灣總督府的〈舊俗調查報告〉，目的可謂是為日本的武力殖民政策著想。

柳田的弟子折口信夫（1887-1953）則進一步指出，民俗學是主張日本為神國神皇神民的國學事學法之一；其提倡柳田那種用所謂「心意傳承」的方法來研究日本人的獨特道德（折口信夫，〈平田国学の伝統〉，載折口信夫全集刊行會編，《折口信夫全集》（東京：中央公論社，1996），頁 445）。另一方面，折口所說的道德，即是他宣稱的一種主義；此主義具道德性之興奮（折口信夫，〈三矢先生の学風〉，同上，頁 456）持此立場的折口，當然也把天皇當作神祇（折口信夫，〈国学とは何か〉，同上，頁 388）。

宇野円空曾強調說：「今日說國體，強調日本精神，必須對如同我們祖先一樣的

是否如他所強調的亞洲文化自發形成，頗有值得細細推敲玩味處；此外，構成岡倉天心思想的背景，也是一個在本書內恐因篇幅所限而無法開展、但值得探討的問題。鑒於中外文對岡倉天心之論評歷年不斷、竹內好甚至認為其思想複雜不清而難下定論之現狀，¹²筆者借此稍伸幾句。

岡倉天心，同明治維新时期大多數社會重要活動者、諸如伊藤博文、福澤諭吉、大久保利通等一樣，出身於一個下級武士家庭。岡倉的父親因藩主命攜家到橫濱經商，又因與外商貿易，使得岡倉從小在英語環境中長大。岡倉7歲起被送到英語學校，以後又陸續在東京外國語學校以及東京大學前身之一的東京開成學校求學。岡倉因之很早就對英語和許多漢文文典有了不錯的掌握。此外，岡倉生涯中的另一個重要轉折點，可以說入學東京帝國大學後得幸遇到其業師、年輕的美籍講師恩尼斯特·費諾羅薩（Ernest F. Fenollosa, 1853-1908）。

1880年，18歲的岡倉從東京大學文學部畢業，次年得到作為恩尼斯特·費諾羅薩助手、調查寺院神社國寶的可貴機會。費納羅薩為美籍西班牙移民後裔，因家庭藝術薰陶，除在哈佛大學讀完哲學與社會學本科外，還在波士頓藝術博物館附屬美校學過油畫。費納羅薩能被日本政府聘請到東京帝國大學任教，說來有趣，緣於1877年開始到東京帝國大學授課的愛德華·摩爾斯（Edward S. Morse, 1838-1925）之招與推薦。這個摩爾斯先生也非等閒之人，其在到達東京的當年，竟能從奔馳的火車車窗中發現日本史前遺跡，並開創了日本的考古學，日本的繩文時代也因其而得名。

在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政治學、哲學、經濟學的青年費諾羅薩是「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積極鼓吹者」、¹³堅信社會達爾文主義。費納羅薩此識，作為時興的外來西方文明，當然影響到了他的高足，包括岡倉天心、哲學家井上哲次郎（1856-1944）、名作家坪內逍遙（1859-1935）以及首任早稻田大學校長的高田早苗（1860-1938）；祇是可惜的是，此方面關聯並未引起過學界的認真關注。譬如，東京大學畢業後的岡倉天心，不但成為費納羅薩的助手，日後與費納羅薩以及費納羅薩的西方友人都有著長年的接觸與聯繫；而費納羅薩與他日本弟子的英文信函，至今尚存，值得引起有志同仁深入

皇祖，懷著深厚的信仰和對神祇深厚的感恩，我們須以此來建設日本人的公私生活。」（宇野円空，《轉換期の宗教》（東京：有光社，1938），頁96。）

¹² 中村光夫，唐木順三，白井吉見，竹內好著，《中村光夫，唐木順三，白井吉見，竹內好集》（東京：筑摩書房，1971），頁372。

¹³ Van Wyck Brooks, *Fenollosa and His Circle* (NY: E.P.Dutton & Co. INC., 1962), p.61.

挖掘研究之興趣。我們由此可知，岡倉天心認為日本民族生而所具特異天生、多次得到皇室嘉獎的井上哲次郎將學術研究惡用於強調日本國粹、強調獨特國體，¹⁴除了國學與後期水戶學的影響，也均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學說的激勵。

日本政府請費納羅薩擔任文部省圖書調查會委員，調查散藏於包括京都、奈良等全國各地古寺廟神社的重要古文物，自是有彰顯日本是文明而非野蠻人種之文明國、弘揚日本獨特文明之目的；但另一方面，通過辛勤、艱難的調查，費納羅薩驚嘆源於中國的古藝術品與繪畫藝術如此深奧，而一掃原先對日本、中國之看法。費納羅薩自此費心蒐集文物、拜日本藝人（如畫家狩野永惠）為師，日後將盡心在日蒐集的數千珍貴文物運出日本，其中大多被波士頓博物館收藏。費納羅薩後來也在該館任職數年東亞藝術部主任；費納羅薩之後，岡倉天心作為首位東亞人也被聘任此職。此外，費納羅薩還與岡倉天心去過中國，並出版過幾本有關東亞藝術方面的書，¹⁵其與第二位夫人合著的 *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英文版《漢字如詩詞之媒介》），至今仍被西方一些大學作為教學參考書。¹⁶

對於思想界中有人讚賞岡倉天心竟能「獨樹一幟」、在那個時代針對所謂黃禍（Yellow Peril）而提出的「白瘟」（White Disaster）危害、強調亞洲文明的主張，我們也應看到其背後的諸複雜社會背景。我們知道，岡倉是在他的英語著作《東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與《日本的覺醒》（*The Awakening of Japan*）中提出上述思想的；而二書均是岡倉在印度以英語寫作並出版——鼓勵岡倉到印度、並在思想與出版方面給予具體幫助的、則是當時著名的英籍女權主義者。其中，女權主義者之一的修女妮維蒂塔（Sister Nivedita，1867-1911）還親自為《東洋的理想》（1903 出版）寫序。聲稱亞洲是人類偉大母親的妮維蒂塔，在印度開設女子學校，支持印度民族主義運動，反對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同時期，活躍於英國與印度的另一女性平權主義運動者安妮·貝善塔（Annie Besant，1847-1933）也與妮維蒂塔聯繫緊密，其與岡倉天心也應有交集。若更進一步深究，我們應知，19 世紀後半期在歐洲興起的女性

¹⁴ Isomae Jun'ichi, *Religious Discourse in Modern Japan: Religion, State, and Shinto*, trans. by Galen Amstutz and Lynne E. Riggs (Leiden/Boston: Brill, 2014), pp.234-235.

¹⁵ 譬如 Ernest Fenollosa, *The Masters of Ukiyo; 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與 *The Classic Noh Theatre of Japan* (with Ezra Pound) 等。

¹⁶ Ernest Fenollosa, Ezra Pound, *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 (N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平權主張與運動，實受啟蒙思想影響、也得益於工業革命發展後所帶來的時代變化；¹⁷此女性平權主張風潮，不久也吹到了日本和中國。¹⁸可以說，反對達爾文借生物學論證女性天生某些方面不足¹⁹所帶來的社會不平等意識、並進而持有反帝反殖民立場，是那些女權主義先驅者的思想之可貴昇華。

通過與費納羅薩在日本各地主要古寺廟神社調查古文物，岡倉天心深刻了解到，古代中華文明與印度文明對日本文明的產生起了巨大影響；所以，岡倉亞洲一體論的理論乃奠基於其對藝術文物之認識上。但另一方面，岡倉認為亞洲一體之主導者，必須是種族優越之日本民族，而岡倉的這個日本種族優越以及所謂「白蠱」之識，則來源混雜：其中既有國學與後期水戶學的日本種族優越、全民須忠孝侍奉神君天皇之專制意識形態主張，也有外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之流毒。1941年，因美國要求日軍撤出法屬印度支那殖民地，美、英、荷切斷日本的石油、橡膠、鋼鐵等物資進口渠道，日本軍部斷然實行的珍珠港突襲、以及為取得戰略資源攻占東南亞等國，襲用的就是岡倉天心在印度提出的亞洲一體論之基調。將白人殖民勢力驅逐出東南亞與印度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口號，掩蓋著對中國、朝鮮之侵略、掩蓋著為東南亞戰略物資之需求之內涵；而戰後審判二戰罪犯的東京國際法庭內，來自印度的法官同情日本戰爭罪犯，亦有此歷史原因。

¹⁷ 有關修女妮維蒂塔為岡倉天心所寫的序，參見 Kakuzo Okakura, *The Ideals of the Ea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 of Japan* (NY:E.P.Dutton and Company, 1920), pp. ix-xxi. 有關修女妮維蒂塔、安妮·貝善塔的事蹟與生平，可參考互聯網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ster_Nivedita ;

http://www.bbc.co.uk/history/historic_figures/besant_annie.shtml

¹⁸ 如 1900 年 6 月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登載的石川半山《論女權之漸盛》文章（《清議報》是梁啟超在日本辦的第一份雜誌）；隨後蔡元培在 1902 年編的《文變》中轉載，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轉引自夏曉虹，〈晚清女權思想溯源〉，清華大學歷史系、三聯書店編輯部，《清華歷史講堂三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頁 256-257。

¹⁹ Charles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71) .

四、結言

徐氏此作，通過對數位中日學人與思想者的思想回顧，不但揭示了日本由明治維新轉向日本軍國主義、同時期包括臺灣地區在內的中國社會劇烈轉型碰撞之一面；也顯示了所謂「東亞之覺醒」所具多歧意義。重要的是，無論從意識形態還是從實質上進行文化鎖國、行文化孤立主義，多為對本身專制統治無自信但卻是受益者；其鼓吹所謂的超優文化特色、優等民族、宗教及國體特殊為矇騙國人，我們不光在德國納粹與日本軍國主義、在前蘇維埃政權、波爾布特（Pol Pot, 1928-1998）之柬共、大搞恐怖活動的宗教原教旨主義那裡，都可見其具體體現。也因此，本書頗可作為研究此時期社會、歷史與文化變遷的重要參考素材，值得推薦之。